

劳伦斯·达雷尔研究

徐彬◎著



劳伦斯·达雷尔研究

徐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伦斯·达雷尔研究/徐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61-9834-6

I. ①劳… II. ①徐… III. ①劳伦斯·达雷尔—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525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劳伦斯·达雷尔 (Lawrence Durrell, 1912—1990) 是常被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们所忽视的、颇为高产的著名现当代英国作家, 曾获达夫·库珀文学奖、布莱克纪念奖, 1982 年获布克奖提名, 198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英国文学史上, 达雷尔位于以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大师之后和以福尔斯 (John Fowles, 1926—2005) 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前, 被李维屏教授誉为“小说实验与革新的杰出代表, 也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路先锋”, 其成名作《亚历山大四重奏》则“充分反映了达雷尔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实验精神”^①。就《亚历山大四重奏》的创作形式和蕴含其中的时空观而言, 李维屏教授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然而就达雷尔小说、游记、诗歌和戏剧作品的政治伦理内涵而言, 对达雷尔的界定远非“后现代小说家”这样简单。实际上, 从其创作时间 (1931—1990)^② 和以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旅居经历为蓝本的文学创作出发, 达雷尔可被视为一位介于现代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

① 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41—345 页。

② 1931 年达雷尔出版第一部诗集《古怪的片段》(Quaint Fragments), 1990 年达雷尔出版最后一部游记《恺撒巨大的幽灵》(Caesar's Vast Ghost)。



民之间具有强烈政治伦理意识的旅居作家^①。

迄今为止，国外劳伦斯·达雷尔研究大多聚焦于其构思巧妙的16部小说。据初步统计，从1962年出现第一部专著起至2012年年底国外达雷尔研究专著有65部之多。21世纪以来，10年间有超过10本专著、论文集问世。依据笔者检索，国外达雷尔研究论文多达200余篇。1980年国外学者在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年会上专门成立了“达雷尔国际研究会”（International Durrell Society）。国外达雷尔研究涉及心理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等领域，主要涵盖五类命题：历史、神话、性爱、自由和小说艺术。虽然国外达雷尔研究已有相当规模，但仍有不足之处，如：1. 达雷尔与众多有相似旅行、写作经历的英国作家之间在创作主题与手法上的异同点尚未理清；2. 国外达雷尔小说的后殖民研究没有突破“东方主义”视角的局限；3. 国外学者还未从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对达雷尔的游记与小说创作进行系统研究，其作品中蕴含着的后殖民文化、政治伦理批评话语有待探讨。

在中国达雷尔是一位被学界“边缘化”了的经典作家。国内达雷尔研究在重视程度、研究成果和研究历史等方面与国外达雷尔研究差距较大。国内达雷尔研究现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对达雷尔后现代小说艺术的整体性概括。李维屏教授在《英国小说艺术史》（2003）中介绍了达雷尔重奏小说《亚历山大四重奏》和《阿维尼翁五重奏》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2. 对达雷尔及其作品的引介。孙建教授在《英国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2004）中为读者提供了《亚历山大四重奏》的故事梗概。谢宇和薛初晴两位学者在《英国文学名著

① 在著名达雷尔研究者艾伦·托马斯（Alan Thomas）编辑出版的达雷尔旅行书信散文集 *Spirit of Place Letters and Essays on Travel* 的前言中，托马斯指出达雷尔曾居住于科孚岛、巴黎、埃及、罗德岛、阿根廷、南斯拉夫和塞浦路斯等地，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达雷尔的作品不应被视为旅行作品；英国著名作家理查德·奥丁顿（Richard Aldington, 1892—1962）认为“将它们（达雷尔的作品）视为国外居住作品（foreign-residence books）更为精确”。以托马斯和奥丁顿的观点为依据，可以将达雷尔旅行、居住过程中的文学创作定名为旅居文学作品，而达雷尔本人则是一名旅居作家。参见：Alan Thomas, “Preface”, *Spirit of Place Letters and Essays on Travel*, Ed. Alan Thomas, Mount Jackson: Axios Press, 1969, p. 1。



便览》(2006)中简要讲述了达雷尔的生平和创作特色,概述了达雷尔小说《黑书》、《亚历山大四重奏》和《阿维尼翁五重奏》的主要内容。

3. 达雷尔小说后殖民研究的初步探索。2004年刘琛老师发表的题为《没落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挽歌——20世纪英国小说的异化主题》的论文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早一篇与达雷尔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该文章以后殖民语境下的自我异化为题对三部小说,达雷尔的《贾斯汀》、格林的《沉静的美国人》以及麦金尼斯的《蜘蛛城》进行了对比研究。

在国内有限的达雷尔研究基础上,本人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一系列达雷尔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劳伦斯·达雷尔的多重身份与艺术伦理选择》、《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解读》、《国外劳伦斯·达雷尔研究述评》、《困在打气筒里的猫——劳伦斯·达雷尔〈芒特奥利夫〉中的亚历山大后殖民寓言》、《达雷尔〈黑书〉中自我与他者之生、死变奏》、《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论达雷尔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殖民伦理的后殖民重写》和《〈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经典化与妖魔化》。上述论文为本专著的撰写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达雷尔的印度童年经历反映在其早期作品中表现为对英国社会文化的“水土不服”;初出茅庐的达雷尔在进行文学实验的同时希望透过作品阐释自身对英国社会的反叛情绪和对英国文化与伦理道德的批判思想。上述作品中,达雷尔表现出对英国社会格格不入的绝缘态度和自我流放的生活决定。1935年达雷尔说服家人移居希腊科孚岛,开启了英国本土之外的旅居创作生涯;在成功逃离英国现代文学“万神殿”之影响的焦虑的同时,达雷尔凭借其小说实验与旅居创作中深刻的政治伦理思想确立了自身在英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经典作家地位。如果说在其早期作品中达雷尔阐发了“失乐园”(印度家园)后“帝国之子”有家(英国)难回的内心焦虑,那么此后的作品则集中反映了达雷尔“复乐园”(重塑精神家园)的创作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达雷尔的旅居经历恰逢20世纪欧洲重要政治、历史时期,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和塞



浦路斯意诺希斯运动等。达雷尔曾暂居希腊科孚岛、埃及、罗德岛、前南斯拉夫、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等地。达雷尔对英国海外殖民、外交工作的参与使其最初逃离“英国之死”、实践自由艺术创作的个人选择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帝国”政治的色彩。流散作家与帝国政治参与者的双重伦理身份常使达雷尔陷入诗情、友情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对特定历史语境下英国殖民政治与外交策略的伦理批判是达雷尔旅居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达雷尔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和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东西方社会为叙事背景将政治、伦理与文化批评熔为一炉，以书写伦理悲剧的方式呼唤人类道德意识的觉醒。

达雷尔曾被亨利·米勒、T. S. 艾略特和劳伦斯·鲍威尔等誉为最具创新精神的作家，其作品开启了后殖民和后现代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对达雷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达雷尔不同形式、体裁作品的分类研究以及对内含其中的伦理选择范式和价值评判标准的阐释将对英国后殖民旅行文学和英国社会后殖民语境下的政治、伦理以及文化价值评价研究有所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倡导文学批评的伦理学转向，以达雷尔研究为契机，笔者希望能为后殖民、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一个分支学科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照。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劳伦斯·达雷尔的艺术伦理选择	(1)
第一节 殖民情节与混杂身份之谜	(2)
第二节 自我救赎的西方佛教徒	(13)
第二章 “帝国之子”有“家”难回	(22)
第一节 被遗忘的“帝国之子”	(23)
第二节 “不能接触的人”与种族歧视	(26)
第三节 沃尔什的英国文化道德焦虑	(33)
第三章 《恐慌的跳跃：一部爱情小说》：自我流放与道德批判	(40)
第一节 自我流放主题的艺术表现	(41)
第二节 爱情、家园主题下的伦理道德思考	(43)
第四章 《黑书》：“弑父”宣言与生、死变奏	(48)
第一节 达雷尔的“弑父”宣言	(48)
第二节 自我与他者之生、死变奏	(54)



第五章 《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政治伦理内涵	(63)
第一节 英埃关系的政治隐喻	(63)
第二节 殖民伦理的后殖民重写	(77)
第三节 场所与伦理解读	(89)
第六章 《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	(105)
第一节 梅林公司与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伦理真空	(106)
第二节 契约关系、“消费快感”与伦理身份危机	(109)
第三节 “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 伦理启示	(112)
第七章 《阿维尼翁五重奏》: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启示录	(117)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精神分析”	(118)
第二节 阿维尼翁的道德审判	(126)
第八章 《朱迪思》:英国“保护伞”下的犹太人“家园神话”	(133)
第一节 英国托管:“保护伞”还是“导火索”	(134)
第二节 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神话”	(139)
第九章 劳伦斯·达雷尔的政治旅居写作	(145)
第一节 罗德岛上“十字军”殖民意识的复写	(146)
第二节 英国对前南斯拉夫的“钓鱼”政治	(153)
第三节 达雷尔的“希腊世界”:诗情、友情与政治	(161)
第十章 从《苦柠檬》看达雷尔的塞浦路斯旅居写作	(168)
第一节 达雷尔“爱岛癖”的成因及内涵	(169)
第二节 “意诺西斯”运动与“亚特兰蒂斯”的陷落	(179)



第十一章 劳伦斯·达雷尔论现代英国诗歌	(192)
第一节 《尤利西斯》与《枯叟》:论艺术与科学间的关系	(193)
第二节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帝国诗歌创作	(201)
第三节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作为宗教诗人的 语言创新	(206)
第十二章 《萨福:诗剧》中的帝国政治与伦理悖论	(210)
第一节 帝国政治背后的“阴谋”	(210)
第二节 帝国欲望与道德惩罚	(212)
附录 劳伦斯·达雷尔生平及主要作品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4)

第一章

劳伦斯·达雷尔的艺术伦理选择

现当代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的小说《恋人们的吹笛手》（*Pied Piper of Lovers*，1935）、《黑书》（*The Black Book*，1938）、游记《苦柠檬》（*Bitter Lemons*，1957）、成名作《亚历山大四重奏》（*The Alexandria Quartet*，1962）^①和《阿芙罗狄蒂的反抗》（*The Revolt of Aphrodite*，1974）等作品为揭示达雷尔的艺术伦理身份和回答达雷尔“为何而写作”的艺术伦理选择问题提供了极佳的文本依据。“艺术伦理选择”指的是艺术家从其艺术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出发而进行的伦理选择，以及在其艺术创作中展现出的伦理旨归；强调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艺术家与作品间双向度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评判之艺术表现体系的建构。国外学者以达雷尔的生平与其作品中对殖民主义政治的赞同或反对态度的表述为基础，认定了达雷尔“殖民作家”或“反殖民作家”的艺术伦理身份，然而这一做法却有简单的标签式解读的嫌疑。

达雷尔的自我流放及其文学创作并不是为抒发殖民主义权利欲望而采取的政治行为，而是作家为了在反抗英国文化的同时实现经济上相对

^① 《亚历山大四重奏》由《贾斯汀》（*Justine*，1957）、《巴萨泽》（*Balthazar*，1958）、《芒特奥利夫》（*Mountolive*，1958）和《克利》（*Clea*，1960）四部小说组成。



宽松、惬意的艺术创作生活而做出的个人选择。这一选择却为达雷尔的文学创作带来意外的效果，即作家所到之地（希腊科孚岛和英属塞浦路斯）的人文地理环境成为促使达雷尔回归印度佛教精神家园的隐蔽动因。对达雷尔身份的界定因而超出了殖民与反殖民作家的范畴，引发有关达雷尔混杂身份和重返精神家园的西方佛教徒等艺术伦理身份的探讨。

第一节 殖民情节与混杂身份之谜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就达雷尔作家身份问题的回答各执一词，可归纳为彼此矛盾对立的两类，即“殖民作家”与“反殖民作家”。第一种观点认为达雷尔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①内的创作均服务于英国殖民政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达雷尔小说中因充满对被殖民他者反殖诉求与斗争的讴歌而使其反殖民主义的写作动机一览无余。国外学者对达雷尔殖民作家亦或反殖民作家身份的评判虽“证据确凿”但这种给达雷尔划分阵营的做法未免过于生硬。达雷尔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作家本人“帝国之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官员的伦理困惑等内心焦虑。由作品反观作家，笔者发现在殖民地写作并以殖民者身份示人的达雷尔却对英国统治下的殖民世界持批判态度，这使得达雷尔的作家身份呈现出混杂性与复杂性的特点。^②

① 英国布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Brighton）的劳伦斯·达雷尔研究专家迪博尔（Michael V. Diboll）指出，《亚历山大四重奏》是处于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联结点上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如将该作品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以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后期的小说世界中，而另一只脚则站在以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为代表的后殖民、后现代的小说世界中。参见：Michael V. Diboll, “Preface”, *Lawrence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in Its Egyptian Context*,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p. xvii - xxxii.

② 达雷尔本人对其混杂身份也有自己的阐释：“有时我感觉自己更像亚洲人而不是欧洲人，有时则相反；有时我感觉自己是用洋泾浜语（Pidgin）思考的长着白皮肤的黑人！”参见：Lawrence Durrell, “From the Elephant's Back”, *Lawrence Durrell From the Elephant's Back Collected Essays & Travel Writings*, Ed. James Gifford, Edmonton: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2015, p. 2.



赫博里切特 (Stefan Herbrechter) 等学者认为达雷尔在塞浦路斯自我流放期间 (1952—1956) 扮演了殖民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达雷尔在担任英国《塞浦路斯评论》新闻官一职期间致力于扩大殖民主义影响和政治宣传。^① 美国新泽西州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的勒塞尔 (David Roessel) 教授指出, 达雷尔的办刊宗旨是“宣传英国气质, 并建立塞浦路斯岛国身份”, 而所谓岛国身份却意味着“要么消除小岛大多数居民的希腊人身份, 要么把他们变成奴隶”。^② 埃及后殖民语境下的达雷尔更加致力于促进英国殖民文化对东方渗透的工作之中, 试图以此维系英国在黎凡特 (Levant 安纳托利亚与埃及之间的地中海东部地区) 构筑的文化帝国。^③

游记《苦柠檬》和小说《亚历山大四重奏》被众多国外学者视为达雷尔维护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文本证据。希腊作家鲁福斯 (Rodis Roufos) 把《苦柠檬》视为“聪明的政治宣传” (intelligent propaganda)。它之所以广受英国读者欢迎, 是因为它让英国公众感觉良好, 也就是说, 不管过去犯过何种错误, 当下英国的殖民政治还算不错, 只有英国的继续统治才能让小岛居民免遭无政府主义的流血暴力事件而引发的灾难 (Postmodernism: 264)。美国南加州大学英文学院布恩 (Joseph A. Boone) 教授揭示了达雷尔隐含于《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殖民思想、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等“东方主义”情节。^④

《亚历山大四重奏》中对现代埃及崛起的描写, 是部分国外批评家将达雷尔看作反殖民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迪博尔 (Michael V. Diboll)

① Stefan Herbrechter, *Lawrence Durrell, Postmodernism and the Ethics of Alterity*,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B. V., 1999, p. 261. 赫博里切特还将达雷尔比作宣扬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的外交“骗子” (diplomatic “trickster”), “《苦柠檬》是他招摇撞骗的把戏之一……达雷尔塞浦路斯之行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和对异国风情的向往, 还是对逝去了的殖民主义背景下印度童年的追忆” (Postmodernism: 264)。

② David Roessel, “‘Something to Stand the Government in Good Stead’: Lawrence Durrell and the Cyprus Review”, *Deus Loci New Series* 3, 1994, pp. 37 - 50, 43 - 44.

③ 参见: Mahmoud Manzaloui, “Curate's Egg: An Alexandrian Opinion of Durrell's Quartet”, *Critical Essays on Lawrence Durrell*, Ed. Alan Warren Friedman, Boston: G. K. Hall, 1987, p. 153.

④ See Joseph A. Boone, “Mappings of Male Desire in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88, No. 1, 1989, pp. 73 - 106.



认为,从《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第一部小说《贾斯汀》(*Justine*)到最后一部小说《克利》(*Clea*),达雷尔逐渐完成了叙述中心“自西向东”、由殖民叙述到反殖民叙述的转变。^①埃及科普特少数民族精英莉拉和纳西姆处于大英帝国消亡、埃及独立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风暴中心,他们是达雷尔笔下埃及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

达雷尔反殖民作家的身份还体现在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行将就木的主题考察。已故苏格兰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弗雷泽(G. S. Fraser 1915—1980)在评论《亚历山大四重奏》时写道:“权力!芒特奥利夫(Mountolive)这一生几近权力的中心,然而他永远不能独立行使权力,他所能做的要么是制止(check),要么是延迟(delay)。”^②“制止”和“延迟”两词高度概括了达雷尔反殖民的批判态度,即大英帝国的殖民势力虽已是强弩之末,却仍垂死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试图阻止埃及的独立进程。

国外学者倾向于将达雷尔简单描述成非此即彼的“扁平人物”,对达雷尔的混杂身份视而不见;而揭示达雷尔混杂身份之谜的关键在于对达雷尔流放生活与艺术创作中的“殖民情节”和“殖民态度”的考察。

出生于印度殖民地铁路工程师之家的达雷尔怀有与生俱来的“殖民情节”。在与法国翻译家克劳迪恩(Claudine Brelet)^③的访谈中,达雷尔不仅表露了几时对父亲在殖民地工作的赞许:“父亲是英国驻印度铁路工程师的先驱”^④,还展现出对当时殖民地生活的喜爱之情:“在印度随着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化,我们不停地搬家,像吉普赛人一样住在帐篷里,总能置身于真实的大自然中……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吉卜林

① Michael V. Diboll, *Lawrence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in Its Egyptian Context*,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 51.

② G. S. Fraser, *Lawrence Durrell A Stud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3, p. 143.

③ 在1979年12月28日写给著名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信中,劳伦斯·达雷尔提及克劳迪恩(Claudine Brelet)曾翻译过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的《无言剧》(*Act Without Words*, 1956)和克劳迪恩与他的访谈计划。参见:Lawrence Durrell and Henry Miller, *The Durrell-Miller Letters, 1935—80*, Ed. Ian S. MacNive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8, p. 508.

④ G. S. Fraser, *Lawrence Durrell A Stud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3, p. 143.



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① 显而易见，达雷尔年纪尚轻，还未能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与印度被殖民者间的利益冲突，儿时印度殖民地的生活也因此显得无忧无虑。^②

然而，12岁时达雷尔被父亲送回英国接受所谓正统教育的经历却在其内心引发了对出生地印度所怀有的“恋母情结”的心理机制，此前对父亲的“赞许”与对印度生活的“喜爱”转变成对殖民者和英国文化的厌恶与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印度的那一刻也是达雷尔近乎一生的流放生活的开始。达雷尔传记研究专家麦克尼文（Ian MacNiven）指出，被抛弃和被背叛了的感觉在少年达雷尔心底油然而生，达雷尔对英国社会和文化批判的态度便是这种逆反心理的产物。^③ 达雷尔对此也有解释：“我批判英国（England）因为我把英国等同于父亲。一到英国，我便即刻感受到英国的虚伪和清教徒主义的盲目与无知……我抵制英国的一切，最主要的原因是想破坏父亲的意愿。”^④

“回国”后的达雷尔既非印度人又非英国人，而是生活在印、英之间身份混杂的人。在其早期自传小说^⑤中，达雷尔诠释了本人作为殖民者后裔，或曰“帝国之子”的身份认同危机。《恋人们的吹笛手》的主人公沃尔什是达雷尔该自传小说中的“他我”（alter ego）。父亲将自己回归英国家园的渴望强加于儿子身上，忽视了儿子对印度家园的认同与热爱。主人公沃尔什遵循了“子从父命”的伦理规约，却陷入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① Claudine Brelet, "Interview with Lawrence Durrell",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33, No. 4, Winter, 1987, pp. 367-381.

② 《象背上观世界》（*From the Elephant's Back*）一文中，达雷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天真无邪的印度童年生活，与印度小象“圣人”（Sadu）之间的友谊成为达雷尔美好童年时光的缩影。参见：Lawrence Durrell, "From the Elephant's Back", *Lawrence Durrell From the Elephant's Back Collected Essays & Travel Writings*, Ed. James Gifford, Edmonton: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2015, pp. 3-5.

③ Ian S. MacNiven, *Lawrence Durrell: A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p. 8.

④ Lawrence Durrell, *The Big Supposer: Lawrence Durrell, a Dialogue with Mare Alyn*, trans. F. Barker, Colchester: TBS The Book Service Ltd, 1973, p. 26.

⑤ 达雷尔在《恋人们的吹笛手》（*Pied Piper of Lovers*, 1935）中追忆了自己11岁至23岁期间离开印度暂居伦敦的生活经历；在《黑书》（*The Black Book*, 1938）中追忆了自己24岁至28岁期间在伦敦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和离开英国前往希腊科孚岛的旅居生活。



达雷尔曾经将自己的经历与鲁德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和萨基 (Saki) 的自传中记述的经历相提并论, 称尽管吉卜林名利双收, 但他在自传《关于我的事情》中却流露出愤恨和不满, 他一直想毁掉那栋他曾寄宿过的房子。据达雷尔说萨基也经受过相同的苦楚。^① 实际上, 达雷尔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与吉卜林和萨基相同的, 介于英、印之间的身份困惑感, 正如吉卜林小说《基姆》中的主人公基姆那样多多少少地重现了吉卜林这种复杂的人格构成, 基姆曾经自问: “我是谁? 穆斯林, 印度教徒, 耆那教徒还是佛教徒?” 基姆一方面体现了白人的优越性和白人的文化价值观, 但同时他的身份又是多重、含混、游移不定的。^② 与吉卜林等人不同的是, 达雷尔从一开始就不想担当“帝国卫士”和“帝国拓疆者”的角色, 尽管与吉卜林相比达雷尔不会因经济原因被迫离开英国, 但他对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厌恶之情让他决意常年生活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年轻的沃尔什对同船回国的殖民者和即将到达的目的地伦敦并无好感。在沃尔什眼中, 站在甲板上的帝国士兵和工程师仿佛“一群疲惫不堪的十字军战士。他们在外征战, 被沙漠里的太阳炙烤、皮肤变得粗糙、体弱多病; 伦敦这一地狱城里无处不在的烂泥更适合他们……”^③

达雷尔还以英国鞋子不适合沃尔什的脚为例, 暗喻沃尔什在英国的“水土不服”。伦敦拥挤不堪的交通、令人窒息的尘雾 (dust-fog) 和海德公园里湿漉漉的绿长椅与沃尔什记忆中美好、祥和的印度大吉岭 (Darjeeling) 小镇生活形成鲜明反差。“他 (沃尔什) 已经习惯生活于一个不同的维度, 一个不同的空间。英格兰是那么狭小”。^④ 面包店主与沃尔什的对话反映了沃尔什落魄艺术家的窘困生活, “这一带住着很多像你一样的穷艺术家。他们总是饥饿不堪, 你也饿了吧?”^⑤ 深夜走

① Fraser, G. S. *Lawrence Durrell A Stud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3, p. 20.

② 空草:《帝国话题中的吉卜林》,《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③ Lawrence Durrell, *Spirit of Place Letters and Essays on Travel*, Ed. Alan G. Thomas, Mount Jackson: Axios Press, 1969, p. 266.

④ Ibid., p. 167.

⑤ Ibid., p. 272.



在肮脏、阴暗的伦敦街道上，孤独的沃尔什感到似乎只有他晃动的身躯和身上的衣服才能让他在这“虚幻的世界”（illusory world）里觉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在伦敦街头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状态是沃尔什“帝国之子”身份困惑的外现。

《黑书》的主人公路西弗（Lucifer）和格雷戈里（Gregory）是《恋人们的吹笛手》的主人公沃尔什在达雷尔自传小说中的角色延续。小说中初出茅庐的作家路西弗和格雷戈里希望借助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发泄对英国社会的不满，正如《黑书》写作期间，达雷尔曾在给米勒（Henry Miller）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在伦敦我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嫖妓——在夜总会里演奏爵士乐、写歌和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一切仿佛一场梦：破碎的酒瓶、痰、罐装食品、腐臭的肉、小便，（屋里）充满性病医院里的气味。……我们[达雷尔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南希（Nancy）]喝酒、我们在死去。^①

出于对生计的考虑，达雷尔曾从事过各种工作，如爵士钢琴手和作曲家、房地产促销员和专业摄影师等；1937年，达雷尔与米勒（Henry Miller）同任期刊《加速器》（*The Booster*）的编辑。20世纪30年代，达雷尔还创作并出版了诗集《私人的乡村》（*A Private Country*）和小说《黑书》（*The Black Book*）。弗雷泽曾用“不安的”（restless）和“万花筒般的”（kaleidoscopic）两个词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达雷尔的颓废生活。^②

达雷尔将本人弃学后混沌的英国生活片段融入《黑书》创作之中，以己为例、针砭时弊，批判了英国文化的贫瘠与伦敦现代城市生活的伦理失范现象。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文学院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in the

① Lawrence Durrell, *Lawrence Durrell and Henry Miller a Private Correspondence*, Ed. George Wicke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64, p. 60.

② Ibid., p. 22.